

宋一元碑刻研究* (中篇)

◆ 张晓旭 (苏州碑刻博物馆)

以上谈了几种宋代全国性石刻地图,下面再谈一下宋代有关单个城市的石刻地图。这方面较为著名的有《平江图》碑和《静江府图》碑。

《平江图》碑,原藏江苏苏州府学文庙,现仍存。宋理宗绍定二年(1229年)由平江府(今苏州)郡守李寿朋重整平江坊市所刊。由吕梗、张允成和张允迪勒石。碑额有“平江图”三字,四边分题东、南、西、北(上北下南,左东右西)四个方位。

该碑图为宋代苏州城平面图,是现今世界上最古老的石刻城市平面图。1961年国务院公布其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平江,即现今的江苏苏州,因北宋政和三年(1113年)宋徽宗升苏州为平江府,故苏州称平江。平江图碑长2.84米,宽1.46米,厚0.30米,青石质地,碑石完好。

苏州城自古以来面积不大(指旧城区),只有14平方公里,但石刻平面图却在这块有限的空间里合理地安排了大运河、城墙、街道、河道、坊市、衙署、楼阁、寺观、街坊、商店、医院、军营、桥梁、园林、古迹等重要设施。图所示,苏州城平面呈长方形,布局规范化。整个城市被大运河所环抱,运河内四周城墙环绕,并设有6个城门,城墙内有护城壕。城区内的最大特点是安排了水陆并行的两套交通系统。需内河道纵横交错,计有20条河流,其中6条河流纵贯南北,14条河流横越东西,总长度为82公里。河道出入城墙的地方建有7座水门闸。与此相适应,城内有20条大街,最著名者为横贯南北的重要交通要道“卧龙街”(今人民路),整个城市交通呈现了“前门是街后门是河”的特色。由于苏州河道众多,因此起着交通枢纽作用的桥梁也特别多。唐代诗人白居易曾说苏州有“红栏三百九十桥”。到了宋代桥梁就更多了,仅《平江图》所刻桥梁就达359座之多(未

刻的桥梁未计算在内)。另刻有264条巷,61条坊,24条里弄。

苏州在唐宋时期,曾是佛教、道教中心,城区内寺观、古塔林立,古趣盎然。《平江图》共刻有67座佛道寺观和9座古塔。

在城的西南部盘门一带,还设有接待外国使臣的馆驿以及粮食仓库、米市。位于市中心的乐桥则是繁华的商业区,有各种商店、酒楼和旅社。城的两端有南寨和北寨两所兵营。

平江城,城中有城,这就是“子城”。苏州在唐宋时的行政级别分别是州、府级,属二级政区。子城是苏州府的政治中心,《平江图》充分反映了它的盛况。图所示,子城位于城内中央而稍偏东南,是平江府衙署所在地,平面呈长方形,四周以城墙环绕。有平江府衙、平江军署、路铃衙、推厅、司理院、提刑司、惠民局、宣诏亭、军资库、教场、医院等43座重要建筑。这个规模宏大的地方官署为唐宋两朝官署建筑提供了重要例证,对后代王府衙署建筑的布局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平江图》用线条标示街巷、里弄、河道,用生动的图画形象绘制古典建筑、自然风光,刻法既粗犷又细腻,是一件难得的艺术珍品。

《静江府图》碑,是我国迄今所见最大的石刻城市平面图。不过它是一块摩崖碑,被锈刻在广西桂林市城北鸪山(今称鸪鹑山)南麓三面亭后的石崖上。通高3.4米,宽3米,现仍存。

从图面主要内容看,显然它是一幅带有军事性质的城防图。据载该图刻有宝祐六年(1258年)静江府(今广西桂林市)为防御蒙古军队入侵前后四次所修城防工事的平面图。图中军事设施有城壕、军营、城墙、城门、瓮城、箭楼、军事指挥署等。该图还绘有山川名胜。其它城市设施,该图所示有主要大街

* 《宋一元碑刻研究》(上篇)见《南方文物》2005年第2期。

11条、官署、桥梁、津渡等。

图碑采用单线阴刻,无图题,图上方刻有文字,记修城经过及工料费用。该图是继《平江图》以后又一件研究中国古代城市发展史以及中国古代城防史的重要实物史料。

另外,刻于宋元丰三年(1080年)的《唐兴庆宫图》石碑也较著名。这幅图为宫殿规划图。1934年在长安出土。该图碑已断损上部,现只残存唐大明宫南门位置以及宫内主要建筑设施,如水渠,建筑方位、名称等,可作为研究唐长安城的参考。碑石现藏陕西省博物馆。

元代石刻地图。元代石刻地图不多,但质量较精。元代出了一位名叫朱思本的大地理学家,在中国地图学史上堪与六朝裴秀、唐贾耽媲美,由他绘制的《舆地图》经罗洪先增补为《广舆图》后,左右了中国地图达二百多年之久,对中国地图制作的进一步科学化产生了巨大影响。

朱思本的《舆地图》是一幅全国性的总地图。自至大四年(1311年)至延祐七年(1320年),用了整整10年时间才绘制成功,而后刻石于上清之三华院(资料依据:瞿镛《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现在这块碑石早已佚失,因此无法了解它的概貌。但据有关史籍记载,我们得知这是一幅用“计里画方”的方法把小幅的区域图合并为长宽各七尺的总图(姚际恒《好古堂书目》)。这幅地图是朱氏游历全国各地并参考《水经注》、《通典》、《元丰九域志》、《元和郡县志》、《大元一统志》等书籍后所绘。

二. 刻帖的登峰造极阶段

我们在《隋唐碑刻研究》(《南方文物》2004年第2期)中谈到了刻帖始于唐代。到了宋代刻帖事业大发展,成为中国碑刻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宋代刻帖是宋代碑刻中的大宗。“帖”从广义上说也是碑刻的一种,因为都是文字石刻。但两者又有区别。区别主要在于其内容和目的不同。一般来说碑具有历史文献价值,主要是当朝人为当朝某事而立碑,或者后世为纪念前人、前朝某事而立碑,其目的在于记事或宣扬什么东西。帖就不同,帖主要是汇集前人的书法艺术作品,或当朝人的书法艺术作品,把它们汇刻在石头上,其目的在于供当朝人或后人学习书法用。

当然还有介于两者之间的称谓,即既可以称之为碑,亦可称之为帖的石刻。这种石刻指书法艺术写得,且内容为历史文献类,对研究社会科学和自然

科学有一定的价值。如《宋绛州重修庙记》,其字体为行书,是集王羲之行书而成,可称得上是书法极品,但其所记内容却是有关寺庙沿革之事,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该“庙记”一身兼两职,即从书法上讲,它是帖,但从内容上看,它是碑。该庙记刻于宋天圣十年(1032年),由李垂撰文、逸民、跌宕集刻。现藏山西绛州。再如《宋解州盐池新堰箴》也是集王羲之行书而成,从书法上讲,它是帖,从内容上讲它却是碑。该石刻于宋天圣十年(1032年),现在山西解州。

至于碑与帖的形制,不是它们的主要区别。如有人将横条的文字石刻说成是帖,竖形的文字石刻说成是碑。其实这并不是碑与帖的本质区别。事实上碑也有横条型的,如唐宋时少林寺的塔铭、明清两代府学的卧碑等等。帖也有竖条形的,如怀仁集王羲之刻的《圣教序》等帖就是竖条形的。

总之,碑帖的区分关键是看其作用和目的,而不完全取决于其形制。简言之,帖是纯书法性质的。碑在于记事。只有把握了这一点,才能掌握碑与帖的实质性区分。

宋代刻帖从淳化三年(992年)摹勒上石的《淳化阁帖》开始,其影响远至明清两代。《淳化阁帖》是一部大部头的汇帖,据载该帖原刻石于河南开封,今已不存。现有多种拓本或翻刻本流行后世。该帖洋洋大观,共十卷。其内容包含十个门类。第一卷为历代帝王书法;第二、三、四卷为历代名臣法帖。第五卷为诸家古法书。第六、七、八卷为集晋王羲之书法。第九、十卷为集晋王献之书法。共计汇集了一百零五位前人的书法作品。

这本帖在碑刻史称为“帖祖”,对后世产生很大影响。自《淳化阁帖》后,宋代掀起刻帖高潮,较著名的有比《淳化阁帖》稍晚的《宋绛帖》,这是一部长达二十卷的汇帖,集录了历代名家书法。此外,还有多种汇帖。如二十二卷头的《宋鼎帖》;二十卷的《宋武冈帖》、《宋凤墅帖》;十二卷的《宋汝帖》;《宋星凤楼帖》;《宋澄清堂帖》;十卷头的《宋秘阁续法帖》、《宋戏鱼堂法帖》、《宋大观帖》、《宋淳熙秘阁帖》、《宋群玉帖》、《宋忠义堂帖》、《宋宝晋斋帖》;六卷头的《宋兰亭续帖》;五卷头的《宋甲秀堂帖》,以及没有卷数的《宋姑孰帖》、《宋二王帖》、《宋慈恩雁塔唐贤题名帖》和《宋越州石氏帖》等等。

上述汇帖集中了历代名家书法,也有极少数帖是汇集宋代名人手迹的。

此外,宋代还有一种属于当朝名人个人所写,并

被当朝人所刻的帖。如声誉卓著的《宋至道御书法帖》，为宋太宗赵灵书。《宋绍兴米帖》、《宋英光堂帖》则为北宋大书法家米芾所书。《宋东坡苏公帖》则为家喻户晓的宋代大文豪苏东坡所书。

宋代刻帖，从主观上说是为当朝或后世提供学书典范。仅这一点就很了不起，因为宋代刻帖影响了一代书风，如宋代书法不蹈前人法度，独辟蹊径，其主体是行书或行楷，这在以上刻帖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另外，从宋代开始，在书法史上有所谓“晋人尚韵，唐人崇法，宋人尚意”之说，这也是主要归功于宋代的刻帖。因为宋代汇集前入法帖，使宋人能够在历代不同的书法艺术风格中汲取营养，从而创造出自己的“尚意”风格。再者，宋代刻帖保存了为数众多的历代名家书法手迹。从保存角度而言，宋代刻帖对中国文化史是一个巨大的贡献。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各种法帖，其源头绝大部分根植于宋朝。元代战争频繁，再加上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因此刻帖稀少。明清两代在宋代刻帖影响下，层出不穷，其数量不下六、七十种，较著名的有《明东书堂帖》、《明宝贤堂帖》、《明真赏斋帖》、《明停云馆帖》和《明郁冈斋帖》等。明清刻帖将在拙文《明清碑刻讲究》中叙述。

三. 纷呈绚丽的少数民族碑刻

与宋对峙的辽、金、西夏、大理国在历史上同属中华民族范畴，为此这些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国家属中国政区范畴，它们所遗留下来的碑刻也就属于我国的少数民族碑刻了。

总的来说，辽、金、西夏、大理国遗留下来的碑刻还是比较可观的，通过这些碑刻我们可以从一个侧面了解这一时期少数民族国家的某些情况。

(一) 辽的契丹文石刻。辽于公元916年建国，国号契丹，年号神册。辽有自己的文字，这就是契丹文，契丹文有大字和小字两种，行文时与汉字同时使用。到目前为止所发现的契丹文(大字、小字)石刻，其分布地区主要在辽宁省西部和内蒙古自治区昭乌达盟等地。制作年代在公元986~1150年之间。历史上的契丹文在金明昌二年(1191年)，废止。契丹文书籍至今没有发现其流传。因此，契丹文石刻就成为研究契丹族历史及其文字的重要史料。

现在契丹文大字石刻共有8种：即无年月落款的《辽太祖耶利阿保机纪功碑》残石；公元986年的《耶律延宁墓志》；1057年的《故太师铭石记》；1072年的《大辽大横帐兰陵郡夫人建静安寺碑》；

1089年的《萧孝忠墓志铭》、《石棺铭文》残石；还有两块残石在辽上京遗址出土。

现存契丹文小字石刻有10余种，即1055年的《兴宗皇帝哀册文》，1076年的《仁懿皇后哀册文》，1101年的《道宗皇帝哀册文》和《宣懿皇后哀册文》，1057年的《萧令公墓志铭》1105年的《许王墓志》，1115年的《故耶律氏铭石》，还有《郎君行记》残石、《萧仲恭墓志》、《耶律仁先墓志》等，其中《许王墓志》和《郎君行记》有对译的汉文，是释读契丹文小字的主要依据。

辽代还有一方纯汉文墓志《契丹耶律羽之墓志》极其著名。该墓志在1992年9~10月间出土于内蒙古阿鲁科尔沁旗罕苏木东南约30公里的朝克图上的耶律羽之墓。志石呈正方形，边长约80厘米，共千余字，字体为楷书。

墓主耶律羽之是赫赫有名的早期契丹皇族成员，据墓志载，其先世为鲜卑石槐的一支，在汉、魏、隋、唐时，世为君长。在早期契丹诸部中耶律姓皇族源于迭刺部，部落首领称“夷离董”，耶律羽之的曾祖父、祖父、父亲都任“夷离董”职，其曾祖父又是契丹国开国皇帝耶律阿保机的曾祖父，因此在辈份上耶律羽之与耶律阿保机还是堂叔兄弟。

墓志还详细地披露了耶律羽之的生平事迹，耶律羽之生于唐昭宗大顺元年(890年)，卒于辽太宗会同四年(941年)，早年随皇太子灭渤海国，渤海国亡后，改称东丹国，耶律羽之任东丹国中台右平章事，并加封为太尉、太傅、东平郡开国公。东平二年(927年)被提拔为东丹国左相，天显十三年(938年)为上柱国。

该墓志内容丰富，对研究鲜卑族、契丹史、渤海国(东丹国)史具有重大的史料价值。

(二) 女真文石刻。金于1115年建国，国号“大金”，年号“收国”。其民族为女真族，主要活动于我国东北地区。女真文为金太祖完颜阿骨打下令参考契丹文和汉文所创，史称“女真大字”。金熙宗天眷元年(1138年)又创立“女真小字”。现存女真文石刻共10余件，主要分布于吉林、山东、河南等地。现有《大金得胜陀颂碑》、《海龙女真国书摩崖》、《昭通大将军同知雄州节度使墓碑》、《奥屯良弼诗碑》、《女真进士题名碑》。另外，还有现存于北朝鲜境内的《庆源郡女真国书碑》、《北青女真国书摩崖》和存于前苏联境内的《奴尔干都司永宁寺碑》。

这些碑刻都很有名，既可以研究女真文字，又可以补史、证史。象《大金得胜陀颂碑》，内容为纪念金

太祖完颜阿骨打破辽战役功绩,对研究历史就很有用处。原石在吉林省扶余市石碑崴子屯东土岗上。该地曾是金太祖在宁江州破辽战役前的誓师处,后因战役获胜,特命其地为“得胜陀”,即得胜处之意。该碑刻于金大正二十五年(1185年)。碑阳刻汉文30行,碑阴刻女真文33行,可对译。原碑曾断裂为二,后修复。该碑为已知女真文字数量最多的石刻。1988年国务院公布其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金代除了女真文碑刻,还有一些汉文碑刻。这方面较著名的有《汾阴后土庙图碑》。该碑现在山西省万荣县后土庙内。碑刻于天会十五年(1137年)。所刻内容为北宋后土庙建筑全貌图。碑高1.35米,有图题“蒲州荣河县创立承天效法厚德光大后土皇地祇庙像图石”24字。图题下为阴刻庙图。其总体布局类似曲阜孔庙、泰安岱庙。它是已知最完整的北宋祠庙图之一。

《大金重修东岳庙碑》,刻于金大定二十二年(1180年),龟趺螭首,高达6.37米,由杨伯仁撰文,党杯英篆额,黄久约楷书。碑文详细地记载了金大定十八年山东泰安岱庙遭受水灾的情景与重修的经过。该碑在造型、碑文、书法三个方面表现了特有的风格,被后世称颂为“三美碑”,现藏山东泰安岱庙。

另外,陕西省吴旗县文物管理所所藏三块金代界碑也很有特色,界碑原在该县长官庙乡白沟村,立于金完颜亮正隆四年(1159年)。碑石均为长方形,高65、宽45、厚8厘米。碑文为隶书阴刻,分三行,刻22字,文曰“正隆四年五月韦娘原界壕宣差兵部尚书尚禄分画定”。据碑文所知,界碑为金代兵部尚书尚禄为韦娘原划定的地界,为研究历史上的土地所有制和使用权提供了重要的实物依据。

(三)西夏文石刻。西夏民族为党项族,汉时为羌族的一支,其活动范围在青海、甘肃和四川三省边境的山谷间。唐后期直到宋代逐步移入今陕甘宁边境。西夏于宝元元年(1038年)建国,国号大夏,建都兴庆府(宁夏银川市),史称西夏,元昊为帝。元昊在位时命大臣野利仁荣等仿照汉文字创造了西夏文字,名为“西夏国书”,下令本民族都用这种文字记事,并用此种文字大量翻译汉文典籍。在宋代,西夏文被官方称为“蕃书”。西夏文于公元1036年颁布,有篆、楷、草三种书体。现存较重要的石刻有《重修护国寺感应塔碑》(在甘肃武威县)、《仁宗寿陵碑》(在宁夏银川市西夏王陵)、《西夏文尊胜陀罗尼咒文石幢》(河北保定市出土),以及北京居庸关过街塔塔座门洞东西壁元代四夏文石刻和甘肃敦煌

莫高窟元代《六字真言碑》。

上述石刻为研究西夏文字的重要资料。如刻于天祐民安五年(1094年)的《重修护国寺感应塔碑》记录了凉州城内护国寺塔于天祐民安三年(1092年)地震时倾斜,皇帝和皇后下诏重修之事,是研究该地区地震史的重要资料。碑高2.6米,碑首为弧形,碑阳为西夏文,碑阴为汉译文。该碑原立于凉州(今甘肃武威)护国寺内,现藏甘肃武威市文化馆。此碑为我国保存最完好、最大的西夏文碑。1961年国务院公布其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另外,还有西夏王陵石刻。西夏王陵是西夏十一座王陵的总称,在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西的贺兰山麓。各陵园有石阙、碑亭、石像生和碑刻等西夏石刻文。1988年国务院公布其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四)大理国碑刻。大理国的前身是公元十世纪初的南诏,其管辖范围为今云南大部地区。在北宋时大理创造了自己的文字,称“白文”或“爨文”。大理文字是一种模仿汉字另创新意的文字,形体基本上接近汉字。现存大理碑刻也有几十种。石钟健先生著有《大理邓川访碑录》对此作过记录。

大理碑刻最著名的是《段氏与三十七部会盟碑》。该碑又名《石城会盟碑》,为大理国第五代王段素顺明政三年,即宋太祖开宝四年(971年)刻石。碑通高1.25米,碑文载白蛮(今白族先民)段氏政权与乌蛮(今云南彝族先民)部族东方三十七部,在石城(今曲靖市)会盟的史实;大理国主段素顺派遣皇叔段子琛到滇东抚治边塞“合集三十七部娉伽诺,十二将弄略”、“颁赐职赏”、“共约盟誓”等,反映了宋代云南大理国白族和滇东的三十七个少数民族部落结盟立誓友好的情况。碑身还刻有众多官职题名,是研究大理国历史和云南少数民族的重要史料。碑现存云南省曲靖市曲靖中学内。1961年国务院公布其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大理国还有《地藏寺经幢》特别著名。地藏寺为宋末蜀僧永照云悟建,经幢为大理国臣僚袁豆光所立(《云南通志》记录)。幢高6.5米,七层八角。其中第一层刻梵文和四金刚,其余各层刻佛像。所刻梵文精美之极,令人叹服。它是云南少数民族文化不可多得的精品文物。现存云南昆明拓东路古幢公园内。1982年被列为第二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五)元代的蒙古文和白话文碑刻

从民族文字角度来说,元代碑刻主要有蒙文碑和白话碑两种。前者包括蒙古畏兀字碑和八思巴蒙

古字碑两类。蒙古畏兀字系成吉思汗时所创。这类碑刻现存的主要有《云南王藏经碑》、《张氏先莹碑》、《移相哥碑》、《西宁王忻都公神道碑》、《竹温台碑》、《释迦院碑》、《紫微宫碑》和《兴元阁碑》等。有的碑刻同刻蒙、汉两文。八思巴蒙古字为元世祖忽必烈时所创。现存这类碑刻近三十种,主要分布于甘肃、陕西、河南、山西、河北、江苏、山东等地。其内容多为皇帝圣旨、皇子与诸王令旨和帝师法旨,这些碑刻通常有汉语译文。

还有一类,如元代皇帝加封孔子、孟子的制书、封赠道士的制诰等碑刻,则以八思巴字拼写汉语,亦属八思巴蒙古字。这一类则属元代白话碑,系元代汉语白话文字碑刻。当时官方文书以八思巴蒙古字书写蒙语,以汉语白话直译为汉文,我们将这种直译为汉文的白话体汉文碑刻,称作“元代白话碑”。如元代寺观碑刻上所刊圣旨、懿旨、令旨,以及加封孔子等碑刻,即属此种文例。

上世纪来,学者们曾著有《元代白话碑》和《元代白话碑集录》等书,可作参考。

四. 宋代儒学碑刻

宋代教育十分发达,与唐代相比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反映在碑刻上的品种极为丰实。

(一) 三种石经石刻

1.《宋孟蜀石经》,刻于广政十四年(951年),原刻九经,至宋皇祐元年(1049年)共刻成《诗经》、《谷梁》、《公羊》、《孟子》等十三经数百块楷书。书者为张德钊、杨灼、孙逢吉等。原碑石藏四川成都学宫,后毁。现上海图书馆、北京图书馆有一小部分此石经拓本。

2.《宋嘉祐二体石经》,为宋仁宗赵祯敕刻,宋庆历元年(1041年)始刻,至嘉祐六年(1061年)毕。所刻为《周易》、《诗经》、《周礼》、《礼记》、《尚书》、《孝经》、《春秋》、《论语》、《孟子》等九经。因其分别用篆书和楷书两种书体书写,故称“二体石经”。原石经数百通,藏河南开封,石久散失,今河南开封博物馆仅存五石。另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均藏有该石经部分拓本。

3.《宋绍兴石经》,刻于宋绍兴十三年(1143年),共有《周易》、《尚书》、《诗经》、《中庸》、《左传》、《论语》、《孟子》等七经,宋高宗赵构书,原石有一百多方,置浙江钱塘岳岳宅,明宣德元年(1426年)吴讷将其移往杭州府学,并刻跋记。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嵌于府学壁中。每经经末刻有秦桧跋

语,现仅存70余石,藏杭州碑林(杭州庙内)。

(二) 其它儒学碑刻

有关儒学教育方面的碑刻,宋代还有不少。如赫赫有名的《大观圣作之碑》,其碑文系宋徽宗赵佶所撰并亲笔书写。此碑主要叙述封建社会的教育制度、学制、学规和培养人才的标准等。当时徽宗下令以此碑文颁之天下州县学,于是刻立此碑在各地云起。现在有十余块《大观圣作之碑》流行后世,山东岱庙有一块,河南、江苏、陕西也有,但岱庙的《大观圣作之碑》最为精巧。该碑高4.5米,宽1.55米,厚0.41米,立于宋大观年间(1107~1110年),是研究古代科举制度的资料。碑文书体为宋徽宗创立的“瘦金体”,在书法史上独树一帜。

陕西兴平县的《宋大观圣作碑》也不逊色,此碑刻于宋大观二年(1108年),由李时雍奉敕摹写,蔡京奉敕题额,其书为摹徽宗赵佶书,即“瘦全体”。

《韩愈五箴碑》,刻于宋宣和四年(1122年),由唐韩愈撰文,李宋篆书上石,碑现藏陕西省博物馆。

韩愈(765~824年),唐代著名文学家、哲学家。该“箴言”反映了他在教育、文学方面的哲学思想,如他反对六朝以来的淫靡文风,提倡散文。此石原藏陕西省文庙府学,作为府学生员(太学生)必读的教科书。

《吴郡登科题名碑》,系宋代苏州府学进士题名碑,现藏苏州碑刻博物馆。碑长1.80米,宽0.90米,厚0.22米,青石质地。碑额字体为篆书,碑文字体为正楷。碑阳系宋人题刻,共刻有从北宋端拱元年(988年)至南宋绍兴十五年(1145年)244个苏州登科进士姓名。碑阴为元人所刻元代大书法家赵孟頫所书《平江路重修苏州儒学记》。

《吴郡登科题名碑》,原系双碑,尺寸相同。另一碑只剩一残碑头,其余全毁。苏州从北宋端拱元年龚识始,至南宋绍定二年王止,历时241年,共出448名进士;以南宋建炎二年(1128年)褚孜始,至南宋嘉定四年(1211年)止,历时83年,共出14名武举进士,共计462名进士。已毁的另一块《吴郡登科题名碑》刻有从绍兴十五年李渥始,至绍定二年王寢改止,历时241年,共出448名进士;以南宋建炎二年(1128年)褚孜始,至南宋嘉定四年(1211年)止,历时83年,共出14名武举进士,共计462名进士。已毁的另一块《吴郡登科题名碑》刻有从绍兴十五年李渥始,至绍定二年王寢改止204名进士题名,总计218名进士题名。

宋代苏州教育极为发达,《吴郡登科题名碑》充

分地反映了这一盛况。苏州人从宋代开始,历元、明、清三朝,步入名人殿堂的,可谓灿若群星。据不完全统计,宋代苏州共出了462进士,明代出了431名进士,清代出了600名进士,在中国科举考试中处于领先地位。

宋代是苏州历史上文化最发达、名人最多的一个朝代。明代徐有贞曾撰文说:“吾苏也,郡甲天下之郡,学甲天下之学,人才甲天下之人才,伟哉!其有文献之足证也。”造成宋代苏州历史名人众多的主要原因,就是宋代苏州教育发达。北宋景祐元年(1034年),著名政治家范仲淹任苏州知州,为了发展教育事业,他奏请朝廷以家乡苏州南园住宅区为基,兴办了宋代历史上第一个又是规模最大的地方学府——苏州府学,府学占地面积10余万平方米。郑元祐在《学门铭》里说:“天下郡学莫盛于宋,然其始亦由于中吴,盖范文正以宅建学,延胡安定为师,文教自此兴焉。”冯桂芬对宋代苏州教育评价更高,他说:“三代下学校之制,至范文正天章阁之议行而始大备。”天下各县之有学,自吴学始,迨至宋末二百年而学遍天下,吴学实得起先。”由于范仲淹对教育十分重视,宋仁宗在庆历四年三月据苏州府学这一做法,下令天下各州县皆立学校,“继此郡县皆有学,而吴固称为首”。

《吴郡登科题名碑》,实际上是宋代苏州教育成果的一次大检阅,所刻462名进士,个个有名有姓,有史可考。他们大都以“学以致用”而著称。在这些入中间,有政治家,如身居要职对国计民生作出重大贡献的宰相丁谓、参知政事(副宰相)范仲淹、元绛、范纯仁、范成大等。其它如吏部侍郎钱象先、魏宪、潘兑、唐辉、凌哲、边知白、枢密副使郑戡,刑部侍郎郑戡,尚书李弥大,侍郎李弥元等人也在其职守范围内对宋代政治、经济等作出过重要贡献。科学家有沈括、黄由、卫泾、郑直等,文学家如程师孟、蒋堂、叶梦得等。大学者如龚程、龚况。政论家如叶清臣、钱象先、范师道、胡元质。藏书家有号称“藏书万卷”的章甫等,以及大经学家章宪、建筑学家何、大教育家胡瑗等,他们在各自从事的领域内对宋代乃至后代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此外,修建儒学学宫的碑刻也有一些,较著名者有三方。一方是《吴郡重修大成殿记碑》,此碑刻于宋绍兴十一年(1141年)。由宋代米友仁书丹、郑仲熊撰文、瞿耆年篆额、徐窠刊石。碑高1.82、宽0.90、

厚0.20米,字体为行书,22行,行44字不等。这是现存最早记载整修苏州孔庙、府学的碑刻。南宋初,江南地区屡遭兵毁,苏州城及府学、大成殿也毁。绍兴年间,社会初定,此时重修府学、文庙大成殿,恢复礼乐,再振东南文化,便成为当务之急。此碑记载绍兴十一年修建府学、文庙大成殿的经过。书写者米友仁(1074-1153年),又名尹仁,是北宋书法家米芾之长子,人称“小米”。其书豪放,笔势精健,对后世笔墨放纵的“文入画”颇有影响。该碑现藏苏州碑刻博物馆。

另一方是《宋芜湖县学记》,由黄裳撰文,米芾书丹,张士亨摹刻。该碑刻于崇宁三年(1104年),碑现在安徽芜湖县学,碑文记述县学沿革及其学规、创办人和培养人才等。

第三方是刻于宋建隆三年(962年)的《重修文宣王庙记》碑,现藏陕西省博物馆。碑文载西安孔庙的历史沿革和历代维修情况。如碑文有“太尉许国韩公时居守,纛务修葺,遂移太学并石经于此”的记载,证明了现在的西安孔庙(今三学街处)是韩建于唐天祐元年(904年)维修长安城时,从务本坊迁来的,同时还说明了大名远扬的《唐开成石经》的迁移经过及其历史沿革。碑文由刘从义撰、马昭吉书丹。

有关儒学方面的碑刻还有两方元代的《加封敕书》碑特别著名。这两方碑石现在江苏南京夫子庙内。碑均为圆首,碑额上阴刻出龙纹,正中为篆字“加封敕书”四字。碑文分别记载元朝统治者对孔子的父母、妻子和弟子颜回、曾参以及子思、孟轲加封进爵事。

元代对儒学倍加重视,至大元年(1308年)加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至顺二年(1331年)6月进而加封孔子的父母,同年9月旋又加封孔子的妻子、学生等,并刻碑于南京夫子庙。

第一块碑为《加封孔子父、母、妻碑》,通高2.23、宽1.14、厚0.23米。碑文共两段,第一段为加封孔子父叔梁纥为“启圣王”、母颜氏为“启圣夫人”,第二段为特封孔子妻儿官氏为“圣圣夫人”。

第二块碑为《加封颜回、曾参、子思、孟子碑》,具体是加封颜回为“兖国复圣公”,曾参为“郈国宗圣公”,子思为“沂国述圣公”,孟子为“邹国亚圣公”。两碑现藏南京夫子庙戟门两侧。

(责任编辑:许智范)